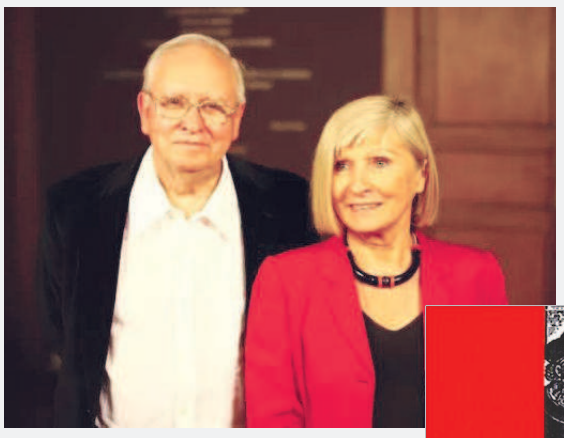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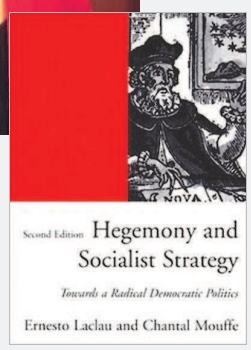
相关链接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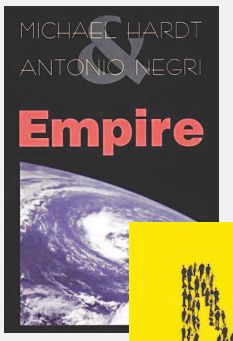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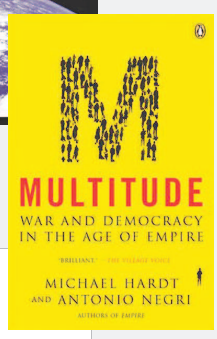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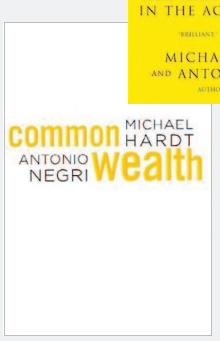
阿根廷学者拉克劳(Ernesto Laclau)(图左)、比利时学者墨菲(Chantal Mouffe)及其著作

拉克劳为文化研究做出了巨大贡献，对霍尔的文化理论影响巨大。霍尔认为，“我所使用的接合理论，源于拉克劳著作《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政治和意识形态》(*Politics and Ideology in Marxist Theory*,1977)。他论述的要旨是，种种意识形态要素的政治内涵并无必然的归属，因此，我们有必要思考不同的实践关系——在意识形态与社会力量之间，在意识形态内不同要素之间，在组成一项社会运动不同的社会团体之间等等偶然的、非必然的连接。”(引自 Grossberg,“On Postmodernism”)

意大利学者奈格里(Antonio Negri)(图左)、美国学者哈特(Michael Hardt)







这两位自治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，代表作是被齐泽克誉为“当下时代的《共产党宣言》”的“帝国三部曲”——《帝国》《诸众》《大同世界》。

他们遵循着马克思的逻辑，认为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后福特制转型，出现了新的主导地位的劳动形式，即以情感生产为特征的“非物质劳动”，为生成新的反抗资本的革命主体创造了条件。霍尔称他们为“新后现代主义者”，他不赞成他们的内在性、情感、自治等理论，但从不停止与他们进行对话。

(上接 2 版)

文化研究应该告诉人们的是，只有当你理解要改变的是什么，才能改变这个世界。如果你把对这个世界的理解简单化或狭隘化，你的努力就会失败。文化研究就是在试图提供一个更好的故事，我认为这个故事应包含以下三点：第一，它包含“正在发生的事情”的复杂性和矛盾，因为这恰恰构成了我们所要反抗的“语境”的特殊性，它必须拒绝把这种“语境”简化为任何一种单一的叙事（例如，把“特朗普现象”解释为另一种民粹主义的民族主义）。第二，它在不断地寻求出路，寻求改变的可能性。莱昂纳德·科恩在我最喜欢的一首歌中这样写道：“一切都有裂缝，这就是光进入的方式。”一个更好的故事就是在裂缝中寻找从前看不见的路径。第三，它在试图告诉人们自己在哪里，不是告诉他们应该去的地方，而是基于我们的判断告诉他们现在正处的位置。

对于政治，知识分子的责任当然是要试图改变这个世界，但关键在于你要有更好的知识。比如，现在美国的许多学者为特朗普的上台而感到恐慌，因为他们发现自己的理论在特朗普身上不适用。但将矛头指向特朗普毫无作用，需要理解和反思的是这背后的语境，因为只有明白我们是如何一步步走到今天，才会知道我们究竟要改变的是什么。

> 我把特朗普和被他吸引的极右势力称为“破坏球”，他们想要的就是反对现有建制

文汇报：在今年的新书中，您对美国政治现状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和批评。您指出，应该正视一个事实：特朗普的背后是美国战后保守主义的崛起。

劳伦斯·格罗斯伯格：让我们重新回顾一下历史。在 20 世纪50—60 年代，保守主义被重新定义，成为今天我们说的“新右派”。他们非常具有自己的战略，其中一个关键人物曾这样说：“现在我在纽约，我要去加州，所以我搭了某个车去芝加哥。我并不想去芝加哥，但这让我离加州更近了。”他们知道自己要去往哪里，也知道妥协的重要性，为了让竞选更有优势，他们抛弃了自己阵营里那些极端种族主义者、法西斯主义者，不让他们公开露面发表言论——这是从里根到布什的做法。但这股极右势力在暗处悄悄地壮大。现在，这股极右势力的“英雄”是特朗普。我把他和被他吸引的这股极右势力称为“破坏球”(wrecking balls)，他们想要的就是反对现有建制，在国内，几乎特朗普的所有举动都是有意无意地在政府部门内部制造混乱，这似乎已经成为了他们的策略。在国际上，他们也在试图推翻现有的国际秩序——他们不敢拿 IMF 下手，因为那样的话经济后果太严重，很有可能再来一次像 2008 年那样的金融危机，所以他们就对准最容易下手的 WTO。

文汇报：过去 50 年来，美国右派保守主义势力在不断崛起。您在书中也这样说：“这个故事，也许是我能想象出来的最噩梦般的故事。我的紧迫感来自于我的失望，我所期待的人们对‘正在发生的事情’复杂、激烈的对话并没有真正形成。”作为左翼学者，您觉得问题在哪里？

劳伦斯·格罗斯伯格：自上世纪 70 年代以来，美国一直在向右走。你不得不承认，右派确实非常具有“战略性”，他们在阅读我们，他们读福柯、拉克劳，然后他们使用这些理论，但我们左派却从不了解他们的理论。这也是我一直以来想让人们看到的故事——问题的关键从来都不是特朗普，他只是一个浮标，真正要对抗的是他背后的战后保守主义暗流。民主党的问题在于总是试图将一切道德化，把右派候选人的某些言论仅仅当成是他们个人品质的败坏，但其实这些都是他们的一种政治宣称，背后是其内部阵营的分裂。特朗普并不是右派中第一个以挑战道德规范行事的人，还有帕特·布坎南（Pat Buchanan），安·库尔特(Ann Coulter)，萨拉·佩林(Sarah Palin)，他们都是反动保守主义的代表，他们拒绝让一切规范约束他们的行为，他们的不文明是一种“战术”。但有些讽刺的是，对于这些人，美国的左派知识分子们仅仅只是在规范的层面上指责他们，说这些行为不够“正派”。

文汇报：您刚才提到，西方左翼理论的问题在于并没有在智识上为我们提供新的知识，而更糟糕的是，左翼理论也正在被对手使用。

劳伦斯·格罗斯伯格：我经常让我的学生设想这样的对话：现在有一位基督教官员，他想禁止性、毒品、色情业，因为他觉得这些都应该是不合法的；同时，又有一位经济学家，他说一切都应该是合法的，因为有利可图。你如何说服这两个人支持同一个政治阵营？我不知道，但右派做到了——他们支持里根，支持乔治·布什。而现在，右派又把左派那里代表差异性、不可还原的诉求以“美国优先”的名义链接起来——哪怕这只是特朗普开出的一张“空头支票”，他并没有告诉人们如何去衡量和实现。这一切都让右派看起来很有“力量”，却也是我想指出的左翼理论所存在的问题。

文汇报：于您而言，霍尔亦师亦友。您在写于 2015 年一篇纪念霍尔的文章中曾这样说，“在生命的尽头，霍尔显然对这个世界越来越

(下转 4 版)

策划：
文汇报理评部
执行编辑：
李纯一 licy@whb.cn
封面编辑：
陈韶旭 csx@whb.cn
封面图片：
复活节岛 800 多座摩艾石像中，大多数都只有头肩部分露出地面（罗新 摄影）

扫一扫微信公众号二维码，关注文汇学人